

五四时期 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任淑坤 著

本书以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状况与文学翻译趋向转变的关系，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时，聚焦五四时期三场关于翻译的论争，分析造成翻译趋向转变、引发可译性论争的原因；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溯源其各自的代表人物鲁迅与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人民教育出版社

WUSI SHIQI WAIGUO WENXUE FANYI YANJIU





WUSI SHIQI WAIGUO WENXUE FANYI YANJIU

五四时期 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任淑坤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责任校对:冯 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任淑坤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01-007940-0

I. 五… II. 任… III. 文学-翻译-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2799 号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WUSI SHIQI WAIGUO WENXUE FANYI YANJIU

任淑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940-0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定位	(1)
一、“五四时期”的时间范畴	(1)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特色	(3)
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意义	(4)
第二节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
一、解放前	(6)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	(7)
三、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至今)	(9)
四、文献回顾总结	(19)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0)
第一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观	(23)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	(23)
第二节 翻译状况	(25)
一、新青年社	(26)
二、文学研究会	(29)
三、创造社	(32)
四、未名社	(33)
第三节 外国文学翻译的特点	(34)
第二章 五四时期关于翻译的论争	(37)
第一节 稳操胜券的论争——双簧信与文学翻译趋向的转变	(37)
一、双簧信与文学翻译批评对象的选定	(37)
二、胡适对批评对象的确认	(40)

三、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	(43)
四、林纾何以成为批评对象	(45)
五、林纾的反驳	(46)
第二节 没有结局的论争——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53)
一、论争过程	(53)
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论争的渊源	(60)
第三节 势均力敌的论争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对话语权的争夺	(66)
一、翻译的作用与地位：媒婆、奶娘？	(66)
二、翻译的动机与目的：主观、客观？	(75)
三、翻译批评：“打架”、商榷？	(77)
四、创造社的精英意识与中心化趋向	(81)
第三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两个世界	(85)
第一节 翻译的世界	(85)
一、晚清的翻译状况	(85)
二、传承与背叛——从晚清到五四	(93)
第二节 文学的世界	
——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106)
一、新诗运动	(106)
二、戏剧改革	(110)
三、题材的借鉴	(113)
第四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	(118)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	(118)
一、近代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传统	(119)
二、启蒙与救亡思潮决定了翻译趋向的改变	(123)
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与启蒙救亡思潮	(126)
第二节 审美情趣	(130)
一、以“真”为美	(131)
二、“悲剧”审美意识的生成	(132)
三、审美主体普遍化	(133)

四、审美功利主义·····	(135)
第五章 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译论	
——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为中心 ·····	(138)
第一节 鲁迅的翻译活动(1909—1927) ·····	(138)
一、《域外小说集》·····	(140)
二、鲁迅与未名社·····	(144)
三、鲁迅与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苦闷的象征》·····	(148)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思想 ·····	(153)
一、翻译作为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途径·····	(154)
二、翻译作为文学和语言引进的途径·····	(157)
三、直译与“失本”·····	(162)
第三节 鲁迅与当代译论 ·····	(167)
一、鲁迅与翻译的政治·····	(167)
二、鲁迅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172)
结语 ·····	(183)
参考文献 ·····	(193)
后记 ·····	(202)

绪论

第一节 选题定位

一、“五四时期”的时间范畴

本书中的“五四时期”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即1917至1927年。其上限的标志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提出了做文章的所谓“八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些主张，作为思想启蒙的檄文，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西学的借鉴，也有独出心裁的发挥。《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问世，声援和发挥了胡适改良文学的主张，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以摧枯拉朽的气势，高扬“文学革命”大旗，抨击了“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念，历数了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委琐陈腐，宣布了文学革命的任务。这两篇文章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幕，导引了中国新文学的方向，标志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正式开始。

下限限定在1927年。自1928年起，新成立的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正式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仿吾、冯乃超等分别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一系列文章，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认为革命文学是“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们肯定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必须

为完成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斗争。他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把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错误的批判，从而引起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他们大力宣扬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要为革命斗争服务，要实现大众化，革命作家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为劳动群众服务。这标志着文学革命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变。

1917—1927年的十年间，长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这一时期，西学大举东渐，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呈纵深之势，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为洋务派以军事、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想，维新派与革命派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思想启蒙所不及。这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的教育、文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外来文学的刺激，直接催生了中国文学革命。在理论导向方面，“王国维批评文艺，便常常引用西洋文学家的话。陈独秀作《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便断定今后中国文艺当趋向写实主义。到了胡适之遂倡文学革命，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揭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因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文学的历史，更坚定他的这种主张。”^①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都从形式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旧貌。中国用白话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始于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文学变革，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

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一般都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他们早年或留学海外，或有机会广泛接触外国文学，或多或少受到歌德、易卜生、拜伦、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等著名作家的影响。用“拿来主义”来形容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引进国外文学的力度并不为过。可以说，五四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影响下诞生，又在外国文学影响下成长与发展。外国文学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新气象。不可否认，不少五四文学先驱都曾在西方文化中徜徉，深受外国文学、文化的熏染；身在国内的许多作家也能直接阅读外文书刊。但是，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实现的。

^①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特色

五四时期，文学思想空前活跃，对外国文学广泛涉猎和介绍，产生了各种文学流派与文学主张。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自始至终与外国文学的译介脱不开干系。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每每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家身上得到印证，即大凡文学家如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等，多参与过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可以说，许多人既是文学家，又是翻译家。同晚清的文学翻译相比，五四时期的译介活动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不仅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带有藉译介外国文学以创造中国新文学的明确目的性，同时也不忽视文学翻译的文学审美功能。如果说晚清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那么五四时期对域外文学的引进则具有一定的自觉性。他们把作品的思想内容放在重要的位置，一般能根据创造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取向，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五四时期输入的外国文学，其主流是“为人生”的文学，文艺理论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尤重视翻译和介绍。“任何时代也没有象五四时期的作家那样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借鉴外国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改革和创新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所在，几乎无一个新文学者不是借重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或革新文学观念以创建新文学理论体系，或以外国文学为范本来创造各种新文体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①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与晚清的翻译一起构成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的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组织、范围，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五四时期都可以看作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但前承了佛经翻译的严肃庄重、科技翻译的丰富多样，而且后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西学引进的高潮，为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五四时期翻译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翻译作为重要职能的文学团体的涌现，这是翻译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以1915年新青年社的建立为开端，文学社团的出现如雨后春笋，重要的文学社团达几十个之多，从新青年社的成立，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未名社、语丝社、新月社等的出现和成

^① 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长。它们创作兼翻译，对翻译和文学事业的贡献不可低估。每一社团，其成员基本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学创作、翻译以及政治、思想倾向，同时又以代表一个社团的成员身份从事译界活动，所以，社团成员的翻译与各新文学社团具有直接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团体为单位的不同的翻译派别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队伍，其翻译的共性与个性都更加鲜明，翻译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翻译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与翻译团体紧密相连的翻译阵地的创建。每一个团体都需要自己创作、翻译、抒发一己之见的园地，于是就有了《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周报》、《语丝》、《新潮》、《西风》、《译文》等文学刊物。这些刊物登载的文章内容颇为丰富，其中有创作、译作，还有关于文学翻译的一些思想主张。这无疑让广大知识分子有了说话的阵地，无论是通过创作还是翻译，表达自己生活的感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与同仁的交流，与异己的口舌之辩，等等。

五四时期是论争纷起的时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胡适与创造社、郑振铎与沈泽民、郑振铎与郭沫若等，涉及团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论争都十分激烈。这一时期的翻译家，多兼是作家，因而对文学翻译中文学因素的关注自不待言。受文化背景、求学经历等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等方面的认识不尽相同。进而，不同的翻译主张的竞相涌现，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不仅在量上实现了大飞跃，而且在翻译思想上也在晚清翻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呈现出繁荣景象。他们关于翻译论争的范围广泛，涉及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等各个方面。这表明，五四时期的译者对翻译的思考和认识日益深入，也说明译者对翻译所持的严肃、认真、审慎的态度。翻译论争中牵涉的一些问题，如译本的选择、译者的地位、译者与文本的关系等，一度激发了文学社团、翻译家的热情，吸引了众多的文学家、翻译家参与其间。论争中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仍是中外译界关注、研究的热点。

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意义

就目前看来，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研究，往往在文学史、翻译史中被一带而过，专论五四时期翻译的论著极少，许多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开掘与深入。五四时期的翻译留给我们的许多显在的资源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许多潜在的资源尚待挖掘。因此，对五四时期的翻译进行专项、宏观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揭示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内在动因和多重追求。通过量化分析、动态考察和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溯源,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盛况包括翻译的数量、作品、国别以及不同社团的译介倾向等进行缕析,充分认识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繁荣、发展趋向和社会思潮、政治状况、思想启蒙等的关系;对不同翻译团体如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在文学翻译的繁荣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客观分析,既关注不同团体的个性,也不忽视它们在共同社会文化背景中所表现出的共性,从而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特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使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翻译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得以体现。

其次,对决定五四时期文学翻译趋向转变的新旧之争(新文化人与林纾)、表明五四译者理论自觉意识觉醒的可译性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不同译介倾向与相同的人文关怀的关于翻译功用等论争的缘起、经过、结果、局限性、积极作用等进行描述和分析,还原纷繁复杂的论争真貌、重新认识当时未能廓清的翻译问题,使得五四时期关于翻译的论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得以凸显。

再次,五四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社会成分复杂的文化转型期,对这一时期的翻译进行研究,对当今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不无裨益。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的研究,无疑也为理解与运用如火如荼的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各种理论提供了冷静思考、认真反思的机会,可以加深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文学翻译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中西译论的共性与差异等问题的认识。

总之,对我国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在翻译本体、文学与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对当今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活动的组织与规划,翻译视域在文学、文化、历史等领域的扩大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节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形成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对其开展全面深入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翻译史的研究有升温之势,实是值得欣慰。但揆诸这些,不难发现,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尚缺乏对这段历史的宏观系统考察。

一、解放前

解放前，已有著作涉及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如黄嘉德编《翻译论集》（西风社1940年版），收入了周作人、傅斯年、鲁迅、成仿吾、郭沫若、胡适等人有关翻译的重要论述，可以作为考察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第一手资料。

杨镇华著《翻译研究》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该书共七章，其中在第三章“‘直译’法和‘意译’法”中提及了周作人倡导的“直译”。当时人们对直译与意译的误解很深，以为“翻译的方法有直译意译两种，并且以林纾的译文是意译，而五四后新近者所译的是直译。因此，许多人便借着意译或直译之名，而行其胡译或死译之实。”作者具体分析了周作人的论述，指出周氏提出直译的条件是“必须达意”，“而保存原文的风格和原语的意思也须在汉语表现力的范围之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译时须稍加变化。可是有些人却并不顾这几个要点。”进而，他指出了直译与意译的区分是不恰当的，直译的流弊是让人看不懂译文，意译的译文则危害更大，除了会让人不知所云，还会误导读者。在翻译实践中，很难分清楚哪句话是直译哪句话就是意译。进而，杨镇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翻译只有一种方法，无所谓直译意译。杨镇华所说的方法就是“翻译五步法”，即寻求原文字义（单字、熟语等都包括在内）；分析原文文句组织；把原文文句所代表的意义变成了有意义的译文语言的话；按照译文文字的习惯和规则，把话写出来；将译文文字加以最适当的修饰。在第五章“诗的译法”中，杨镇华提及了成仿吾提出的译诗的四条标准，即“要以诗译诗、应传原作情绪、应传原作内容、应取原作形式”和达到这四条标准的两种翻译方法“表现的方法（Expressive Method）和构成的方法（Constructive Method）”，指出成氏的两种方法“虽似可行，但还嫌不十分具体”，因而又引出了曾孟朴在批评张凤用各体诗译外国诗的实验时提出的五个条件：“理解要确、音节要合、神韵要得、体裁要称、字眼要切”，并指出，如果译诗达到这种程度，当然会让读者“低徊讽咏”，听者“欲歌欲泣”。然而事实上“诗这东西往往是不能翻的”。在章末，他引用了周作人的话：“诗是不可译的，只有原本一首是诗，其他的任何译文都是塾师讲唐诗的解释罢了”。他评论到：“这话虽说得过于严格，却也有一部分的真理的，只是我们从事翻译的人却不能否认翻译的不可能。”

此外，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的考察还出现在一些文学著作中。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田禽的《中国戏剧运

动》等。其中，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第八部分即以“翻译文学”为题。但其着眼点主要在晚清的翻译文学，他只在文章结尾处提到：“到了文学革命以后，一时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人如龙腾虎跃般的起来，小说戏剧诗歌都有人翻译。翻译的范围愈广，翻译的方法愈有进步，而且翻译的文体大都用白话文，为了保存原著的精神，白话文就渐渐的欧化了。”^①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的第七章“翻译文学”，专门对五四时期的翻译予以阐述。作者充分肯定了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与影响，认为只有十五六年历史的新文学的繁荣除了国内作家的努力这一原因外，还应归功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② 作者还充分肯定了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对于翻译事业的贡献：“各种文学团体，会社，莫不竟先翻译外国书籍。这时候，国内的学社，有共学社，尚志学会，中华学艺社，少年中国学会……都对于翻译工作甚为努力。但这些学社，研究的范围，不限于纯文艺，有的还是用文言译书，所以翻译事业，仍然不大盛兴。直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未名社相继成立，国内才有纯文学的会社翻译的事业，至此才算到了正式发达的时期。”^③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解放前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认识，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层面。论及五四时期的翻译，主要是：第一，对五四时期翻译理论的扼要介绍与引用。第二，只言片语似有折中之嫌的评价，如“虽似可行，但还嫌不十分具体”、“这话虽说得过于严格，却也有一部分的真理的”。第三，肯定翻译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

建国后，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尽管数量很少，但毕竟拉开了研究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序幕。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发表了《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冯至、陈祚敏、罗业森）和《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

①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②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书店据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影印，第259页。

③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载《民国丛书》（第五编），第261页。

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季羨林等)两文。前者总结了从五四运动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八九年间,中国翻译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文学的大致情况。作者认为,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之所以起了根本变化,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通过“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的倡导和努力,“翻译事业便和当前的需要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最终,“进步的力量终于扭转了‘五四’以前那种混乱的、无原则的、不接近人民群众和不配合革命斗争的翻译界的落后现象”,奠定了以后四十年现实主义的翻译工作路线。此外,该文总结了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两个特点:一是对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重视;二是对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

叶水夫《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在中国》(《世界文学》1959年第9期)、卞之琳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等文章,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介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在中国》一文指出,五四以后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介绍很快形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巨流,几乎没有一个文学杂志、没有一个出版社,不刊登或不出版俄国作家的作品。德国文学由于创造社的介绍而广泛流行,东欧各国的文学也受到重视。《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在总结建国后十年翻译工作的成就时饮水思源,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正确方向、严肃态度、积极影响、优良传统都始于鲁迅、始于五四,并指出,五四运动之后“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也需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学习一些东西。”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虽然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文学与翻译的研究受到各种政治风潮的左右,无论是思想观念、立场看法,还是话语方式都不够心平气和,其倾向性与偏颇之处不言自明。《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文的字里行间就洋溢着浓厚的革命色彩和战斗气息,如“我国现代的翻译史里始终贯串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斗争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先是五四运动前后革命的民主主义文学和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随后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等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为了中国的需要,来介绍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而以胡适为首的一些帝国主义奴才则完全丧失民族立场,要求人们一心一意地走所谓‘世界化’的道

路”；胡适、徐志摩等动辄便被冠以“帝国主义奴才”、“反动文人”的称号，等等。

三、改革开放以来（1979 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学术风气的转变，学术研究开始步入正轨，翻译界亦然。翻译史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关注，研究成果陆续面世。主要成果有：

（一）著作

涉及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著作有（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陈玉刚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臧仲伦《中国翻译史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王健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以及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进行了研究。

其中，《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一书介绍了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概况，包括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初期部分，作者介绍了五四时期的重要社团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的翻译活动、特点及主要翻译倾向；还重点介绍了五四时期的重要翻译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中国翻译史话》一书以“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为小节标题，介绍了五四前后的文学翻译，并总结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三个特点：“一，重视对俄国古典文学和早期苏联文学的翻译；二，重视译介被损害民族，特别是东欧和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三，重视译介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①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第三章“民国时期的译学理论”，对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朱自清、林语堂在内的民国时期的二十多位翻译家及其翻译理论和

^① 臧仲伦：《中国翻译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2 页。

贡献作了具体阐述。在“章末片谈”中，对民国时期的翻译状况进行了综述。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特点基本可以从“社团与流派角度区分”，这一时期译论上的“批评、讨论和争辩是很热闹的，这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①此外，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也提出了“外部研究”的前景。

《翻译文化史论》侧重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着力研究翻译对于译入语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过滤作用等。作者追述翻译、文化的历史特点，指出人类创造的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特征，因此不同文化需要沟通，文化的沟通就需要翻译，“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翻译文化史主要就是从历史发展上研究这两者的关系”，“考察两种（或多种）文化如何发生交流，这种交流产生的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②该书第三章“中国近代部分”第四节“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在总结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遵循了“现实主义的翻译工作路线”并辅以浪漫主义文学后，主要描述了俄罗斯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法国文学及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英国等国文学的译介，这种译介态势与当时中国国情是相辅相成的。该书还指出，翻译文学的繁荣对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语体文的成长”、“新诗的诞生”、“话剧运动的展开”、“小说与散文”“新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五四到建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的专著，主要涉及了这三十年文学作品译介的方向、译介态势、文艺期刊的作用、译介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等。资料翔实，爬梳缕析清楚，注释详尽，显示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力，为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研究做了大量铺垫性的工作，其功不可没。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丰富，涉及面广，其内容与意义是一本专著难以涵盖的。诚如作者本人所言，此书的“讨论仅仅是一个轮廓，其中有的部分未及细究，更不可能穷尽”^③。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研究外国文学在中国译介、接受及影响。该书上编历时性地叙述了各个时期主要翻译家、文学团体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贡献；下编则以作家、作品为主线，按国别和语种设立专章，对俄苏、英、

①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②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③ 王健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前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美、法、德、日等国文学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做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

（二）论文

关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研究论文，秦弓、袁荻涌、姚君伟、赵明、平保兴、河洛易、若兵、张萍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论文讨论的主题基本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作品译介研究

秦弓《“泰戈尔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对五四时期译介兴起的“泰戈尔热”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对泰戈尔的译介、研究及其影响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泰戈尔热”之所以形成，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与日本思潮的变化有关，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五四前后中国内在需求同泰戈尔文学的人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主题、东方文化底蕴及其人格力量的契合。袁荻涌《易卜生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及其影响》（《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指出：易卜生作品之所以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契合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需要，有助于民众的思想启蒙和反封建斗争的开展。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广泛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教育、妇女、家庭等问题，笔锋犀利，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它们首先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注意。秦弓《易卜生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4期）也指出，五四时期对易卜生剧作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剧，这强化了问题意识，推动了“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的兴盛，也促进了话剧的发展。当时对易卜生早期的民族浪漫主义与后期的象征主义剧作翻译得较少。

姚君伟《美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勾勒了美国文学在中国近现代的译介情况，其中对五四时期的美国文学译介也进行了扼要阐述。作者在文末归纳了五四时期译介美国文学的几个特点：第一，翻译文学的兴起同中国的政治、社会的需要有关；第二，翻译的内容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第三，译介者多具有译者、学者和作家的多重身份。

平保兴《论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特点》（《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5期）指出，五四时期我国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而俄国文学作品为当时翻译过来的各国文学作品之首。作者归纳此间译介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点：第一，文学翻译作品体裁的多样性；第